

基于彝族历史文化视角的大汶口文化“字符”考释

段树乔¹，郭宸利²

¹云南大学软科学与系统工程研究中心 云南昆明

²云南省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 云南楚雄

【摘要】彝族先民与东夷人之间曾经有过互相交往、交流和交融的时空框架，因而用古彝文字来解读大汶口文化刻画字符不失为探究大汶口文化的一种新途径。通过将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大口尊、象牙梳和龟甲上的 11 个刻画字符与滇东南古彝文字对照释读，使刻画字符本身得到圆满解释的同时，更可使刻画字符与其载体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比较合理的说明。考释证明，大汶口文化“刻画字符”在该文化区域内得到了人们的公认和承传，说明这些“文字”已经比较成熟和规范。

【关键词】大汶口文化；刻画字符；古彝文字；释读

【收稿日期】2024 年 11 月 13 日

【出刊日期】2024 年 12 月 20 日

【DOI】10.12208/j.ssr.20240042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acters of the Chinese Dawenkou culture from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of the Yi nationality

Shuqiao Duan¹, Chenli Guo²

¹Yunnan University Soft Science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Kunming, Yunnan

²Chuxiong Yi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Chuxiong, Yunnan

【Abstract】 There was a time and space frame of mutu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and blending between the Yi ancestors and the Dongyi people, so using the ancient Yi characters to interpret the characters of Dawenkou culture is a new way to explore the Dawenkou culture. By comparing the 11 characters on the Zun with big mouth, ivory comb and tortoise carapace unearthed from the Dawenkou cultural site with the ancient Yi characters in southeast Yunnan, the carved literal symbols themselves can be explained satisfactoril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arved literal symbols and their carriers can be explained reasonably. The interpretation proves that the "carved literal symbols" of Dawenkou culture has been recognized and inherited by people in this cultural area, indicating that these "characters" have been comparative maturity and standardized.

【Keywords】 Dawenkou culture; Carved literal symbol; Ancient Yi character; Interpretation

1 前言

大汶口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重要原始文化之一，其因发现于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而得名，文化分布于黄河下游一带的山东全境和皖北、苏北、豫东地区，其年代大致在公元前 4500 年至前 2300 年之间，延续时间约 2000 年左右。可以说，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大汶口遗址发现和发掘以

来，丰富的出土文物和刻画符，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和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已经对大汶口文化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可以说“在中国考古学中，大汶口文化的被认识，是对中国东方史前社会史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1]特别是大汶口文化刻画符的发现，为探究古代中国文字起源提供了最有力的依据。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于大汶口文化的刻画符的释读始终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考释、研究工作还

作者简介：段树乔（1961-），男，彝族，云南省系统工程学会高级工程师，云南大学软科学与系统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高级会员，云南省系统工程学会理事，研究方向：社会系统工程和民族历史文化研究；郭宸利，女，彝族，云南省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民族文化研究。

在继续, 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关于刻画符的属性。王树明先生认为: 安徽蚌埠双墩出土的大汶口文化刻画符是“文字类符号, 而且已经脱离了写实性阶段, 进入中国古代文字发展的第二个阶段。”^[2]李学勤先生也认为: “大汶口陶尊符号, 形象明显经过抽象化。”^[3]明确指出“大汶口陶器符号是文字”^[3]。但是, 汪宁生先生则认为: 大汶口文化陶器之上的刻画符“还不能说就是文字。就目前材料来看, 它们属于图画记事性质。……因为真正的文字要从表音开始, 是能够记录语言的符号。陶器上这几个孤立的图形, 还不能证明这一点。……这些图形刻于陶器上, 当是作为作器者的一种氏族标记。”^[4]王晖先生也认为: “把距今 8000 年左右裴李岗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文符号或距今 7000 年左右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出土的陶符视作汉字的起源, 把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晚期陵阳河遗址陶符看作早期文字, 是没有理论根据的。”^[5]卢丁先生则认为: “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刻画符号(或图画符号), 它们绝对没有记录和传达语言, 扩大语言在时间与空间上交际的功用。因此, 我们认为这些刻画符号仅仅是符号, 决不能说它们是文字。”^[6]显然大汶口文化的刻画符是不是文字的争论, 言人人殊, 难以论定。

第二、关于刻画符的释义, 则见仁见智、百花齐放。有的把大口尊上的刻画符与其出土的地理环境相联系进行解读^[2], 有的按《尧典》所载的“历象日月星辰”和“寅宾出日”来解读陶尊上的刻画符^[7], 有的用大汶口遗址出土的獠牙勾形器柄上的刻符、象牙梳上的雕刻符与《系辞》中八卦卦形符号进行比较研究^[8], 甚至有的专家认为大汶口文化的陶符是人类对生殖崇拜的表现^[9], 等等, 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总而言之, 研究者都局限于汉文化的藩篱, 囿于传统的基于汉语汉字的“形”和“义”的文字研究方式, 在“是否能够记录语言的符号”问题上裹足不前, 更有人认为“文字性符号, 说它们是‘文字性’的, 是因它们能和后来的甲骨金文形体结构相对应。”^[5]显然, 其将是否能与“甲骨金文形体结构相对应”作为判别是否属于字符的标准了。甚至有的对单体图形或符号所表示的含义不清楚就断言“单体类的文字性符号并不是正式文字”^[5], 请问何谓正式文字? 王晖先生显然是以“是否组词成词组或句子”^[5]作为标准了。

众所周知, 在迄今 5000 年左右的中原(包括东

部地区)大地上, 并非只有今天汉族的先民, 这里曾经是汉藏缅语系等民族共同的祖地, 正如有学者指出: “藏缅语族人群是仰韶文化的主要继承者之一, 其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的前身——磁山、裴李岗文化。”^[10,11]就说大汶口文化也属“夷”文化的范畴, 确切地说“中原地区的华夏族正是因四夷在中原的汇聚、相互融会而形成的。”^[12]那么, 就有可能形成多元的文化和文字系统, 难道彝族至今还在使用、赓续 8000 年的贾湖刻画字符不是文字吗? 冯时先生说得好“有关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 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指汉字起源的研究。事实上, 我们只有跳出汉字一统的传统窠臼, 将可供研究文字起源的原始史料置于不同考古学文化的背景之下加以讨论, 才可能获得客观的结论。”^[13]所以要解释大汶口文化“刻画字符”应该需要在当时的时空框架中进行定位、解释, 应当与华夏民族早期历史与文化紧密联系起来。

彝族是华夏民族在夏商周初时期从中原回到大西南的一部分, 其有史前的中原时空框架, 承传了中原许多史前文化^[14]。彝族现在所用的许多文字, 也可从中国史前刻画符中找到, 三星堆 2 号祭祀坑出土的石边璋和青铜立人像座山的“图画文字”用古彝文字得到了比较合理的解释^[15], 可从彝族祭祀文化和占卜释读陶寺扁壶朱书“文字”^[16], 甚至可以追溯到贾湖甲骨刻画符、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 M44 出土的龟甲刻画符, 就如冯时先生指出: 运用古彝文解读贾湖龟甲契刻文字、大汶口文化陶尊和良渚文化玉璧上的刻画文字, “在使文字本身得到圆满解释的同时, 更可使文字与其载体之间的关系得到合理的说明。这充分证明了彝文字体系是与夏文字同时共存的古老文字。”^[13]所以, 从彝族的历史文化视角出发, 研究大汶口文化刻画字符更符合当时时空框架下东夷人在这些器物上刻画的初心。

2 大汶口文化刻画字符与古彝文字对照考释

2.1 大口尊及其刻画字符

大口尊是大汶口文化代表性的器物, 可谓国宝重器。20 世纪 60 年代, 大口尊首次在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发现, 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随后, 在莒县杭头遗址、诸城前寨遗址、蒙城尉迟寺遗址、大朱家村遗址等地连续出现, 据 2019 年 4 月 9 日《齐鲁晚报》报道: 2018 年 8 月在泰安市宁阳县于庄东南遗址抢救性发掘中也出土了一具, 再次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到目前为止, 在大汶口文化分布的区域内,

出土有大口尊的大汶口文化遗址 10 余处, 完整器形不到 50 具^[1], 有刻画字符的大口尊则更少。字符有五个, 均为单个字符刻写在不同的大口尊上, 如图 1 所示为大朱家村遗址墓葬^[17]和陵阳河遗址墓葬^[18]出土的有刻画字符的大口尊, 这些大口尊及其刻画字符有如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大口尊出现在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的父系氏族社会的鼎盛时期, 这种带有刻画字符的大口尊却是大汶口文化中一种特殊的器形, 可能与死者的生前地位有关, 也可能与祭祀有关^[1]。《发掘简报》也认为: “带有刻画字符的大口尊多出土于大型墓葬中, 说明大口尊不被普通氏族成员所拥有, 更不是常人用于随葬的器物, 它与墓主生前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 是显示墓主身份、地位的象征物。”^[18]

第二、大口尊都出土于墓葬, 表现出与其他生活器具不相融合的现象, 因此并非生活用具, 可能是一种“殡葬礼器”。

第三、这些刻画字符几乎都出现在大口尊之上的同一位置, 不见于其他生活用具之上。而且有的

在刻画符之上涂有朱红颜色, 这种现象应该与瓮中精灵有关。所以说, 大口尊——刻画字符——墓葬, 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1]。

第四、大口尊上的字符为单个, 说明这个独立的字符就能表达刻画者的初心和目的。因不见于其他生活用具之上, 所以这个字符与载体“物语”之间有明确的语法关系。可能这个字符是名称, 作为定语来修饰载体。

第五、在不同的遗址(即不同的时空)出土的大口尊为“就地取土, 就地烧制”^[19], 而且在器形方面比较固定, 所刻画的字符一样、刻写的位置一样, 正如王吉怀等学者所言“刻画图案与大口尊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1], 说明不同的遗址人群除了有相互交往、交流和交融外, 字符的音、形、义和使用已经规范, 并得到了传播和承传。

第六、大口尊不是普通生活用具, 而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新出现的一种特定器物。大口尊上的刻画符号, 表达的也是一种具有宗教内容的刻符^[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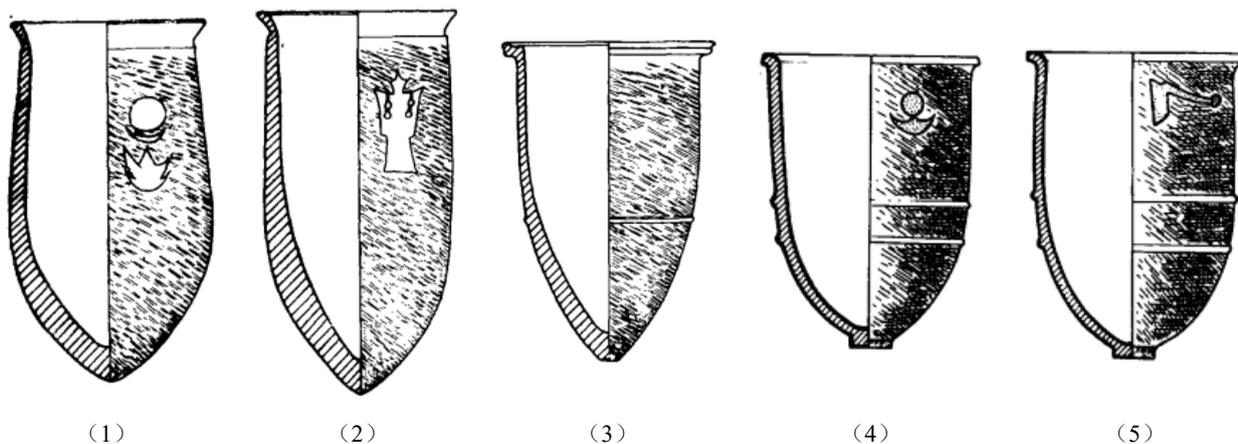


图 1 大汶口文化大口尊及其刻画字符(《论大汶口文化大口尊》截图)

- (1) 大朱家村墓葬大口尊(采 01); (2) 大朱家村墓葬大口尊(M17:1); (3) 大朱家村墓葬大口尊(M26:3) 刻画字符为“𠄎”; (4) 陵阳河遗址墓葬大口尊 I; (5) 陵阳河遗址墓葬大口尊 II。

大汶口文化大口尊上的刻画字符在滇东南一带的古彝文献中频频出现, 都可以找到完全相同的和相似的文字与之对应。表 1 是大口尊刻画字符与《滇南彝文字典》^[20]对照释读表, 从中可知, 运用这些古彝文字释读大口尊上的刻画字符, 确实反映了大口尊及其刻画字符的殡葬礼器、墓主地位、宗教内容、字符与载体之间的关系、字符规范与承传五个特点。“霸王尊(皇尊)”、“龕尊”、“拜尊”、“圣尊”、

“王尊”这些殡葬术语(或用语)即使是现代还比较盛行, 说明当时的东夷人已经有了“文明的殡葬礼制”, 能用字符和大口尊为逝者歌功颂德、向逝者祈求福禄。

从上面的解读情况来看, 大朱家村墓葬大口尊(采 01)和尉迟寺墓葬大口尊(M96、JS4)上的刻画字符与我们以往所认为的“日”、“月”、“山”或“日”、“月”、“火”图案元素无关。也许有人会问, 这不符合东夷人“旦明祭天”^[2]的太阳崇

拜文化, 笔者认为正是有“大汶口文化的太阳崇拜”才误导了我们对这些刻画字符的正确释读, 这个问题关键就出在我们习惯用传统的汉语文字的“形”和“义”去解读大汶口“字符”, 从“甲骨文金文形体结构相对应”的“文字性”标准去释读这些字符, 没有把字符与载体之间的关系结合起来进行考释。前面讲过发掘出土的大口尊均属殡葬礼器, 显然就不会与太阳崇拜相关了。表一中从上到下的第一和第五个字符王树明先生则根据“字符”出土地陵阳

河遗址的地理环境解读为“烜”和“炅”字^[2], 显然王先生把这两个字符解读成为“陵阳河遗址的地理标志”了, 而且也是囿于汉语汉字的“形”和“义”。众所周知, 这两个字符不仅仅是出自陵阳河遗址, 也出自在大朱家村遗址和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 “字符”时间跨度从大汶口文化中中期到晚期一千多年, 这从“陵阳河遗址的地理环境”来解释就显得有些欠妥。再说, 大口尊作为殡葬礼器, 把他们释为“烜”和“炅”字, 似乎文不对题。

表1 大口尊刻画字符与滇东南古彝文《滇南彝文字典》^[20]对照释读表

刻画符	载体和位置	古彝文字	彝文释义	页码
	大朱家村墓葬大口尊 (采 01) 腹上位		“霸”、“霸王”, 与载体的“物语”形成混合寓意, 释读为“霸王尊”。殡葬礼器, 送给墓主以彰显其地位, 表达其高贵和富有, 可能墓主是称霸一方的君王。 大朱家村遗址和尉迟寺遗址出土的大口尊上字符下部分有一些差异, 有人认为是“山”, 有人认为是“火”, 其实这是一个“日冠”的象形字。整个字符由“王”的字符“  ”和“日冠”的字符“  ”组成, 这是一个由两个表意、表音字组成的字符, 写时从上到下“王戴冠的”, 读为从下到上“戴冠的王”, 与汉字“皇”同义, 则此尊有“皇尊”之意。如果按汉语汉字构成规则, “  ”应在“  ”之上, 但并非如此, 说明东夷人的语言也像彝语一样“定宾颠倒”。	第 239 页
	尉迟寺墓葬大口尊 (M96、JS4) 腹上位		《说文》曰“皇, 大也。”彝文“  ”也有“大”之意, 说明汉、彝文字具有同源性。	
	大朱家村墓葬大口尊 (M17: 1) 腹上位		“神位”、“神龛”, 与载体的“物语”形成混合寓意, 释读为“龛尊”。殡葬礼器, 送给墓主以便向神灵或祖先彰显其地位、高贵和富有。 刻画符中有“  ”, 意为“祖魂”。	第 13 页
	大朱家村墓葬大口尊 (M26: 3) 腹下位		“跪拜”、“求”, 与载体的“物语”形成混合寓意, 释读为“拜尊”或“祈尊”。这是向墓主祈求庇护家人、福禄安康的殡葬礼器。 这个字符在尊腹下位, 所要体现的文化是生者对逝者的祈求。	第 5 页 第 86 页
	陵阳河遗址墓葬大口尊 腹上位		“圣人”, 与载体的“物语”形成混合寓意, 释读为“圣尊”。殡葬礼器, 送给墓主以彰显其地位, 说明墓主是一位德才兼备的思想家。	第 12-13 页
	陵阳河遗址墓葬大口尊 腹上位		“王”, 与载体的“物语”形成混合寓意, 释读为“王尊”。殡葬礼器, 送给墓主以彰显其地位, 说明墓主是一位王者, 由于其无“  ”, 所以地位低于采 01、M96、JS4 的墓主。彝文字符“  ”为“鬼”, ^{[20]435-437} 所以彝族文化中“王”又称“鬼主”。	第 336-337 页

2.2 大汶口文化墓地出土的象牙镂雕旋纹梳及其雕刻图案“字符”

1959年在山东宁阳大汶口文化墓地 M26 中出土了一件象牙梳^[8], 在堡头村古代遗址清理过程中也发现一件有同样的象牙镂雕旋纹梳(有些残缺)^[21]。M26 中出土那件象牙梳完好无缺, 有复杂镂空雕刻图案。整体略呈长方形, 长约 17 厘米, 顶端有 3 个透雕小圆孔“○”, 梳身中部用平行的三条孔组成类似“S”形(也有人称“8”形)的透雕装饰, 内填有 2 个“T”形花纹, 在“S”的左右、上方有条孔, 构成了一个长方形的装饰画面(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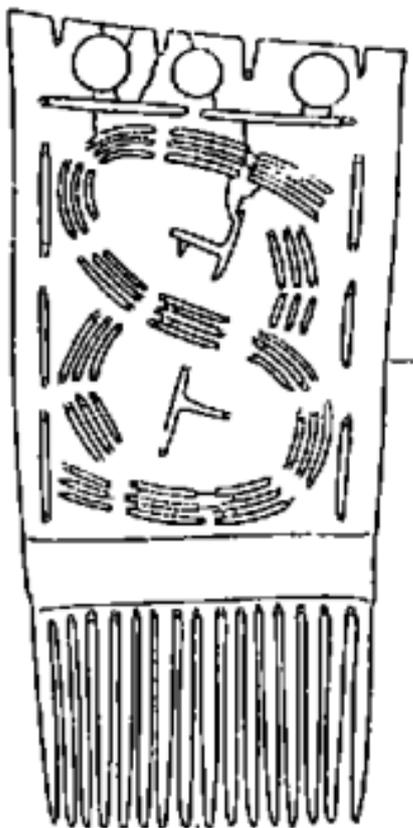


图 2 大汶口遗址 M26 出土的象牙梳

这件象牙镂雕旋纹梳上的图案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解读, 学者张学海和李玉亭认为“这把梳子上刻画的图案就是原始的八卦符号的源头。”^[8]黄懿陆先生则认为这把象牙梳上的图案是“仰观天象, 俯察万物使用的太极图。”^[22]也有

人认为梳子上不会刻上八卦符号, 该梳子只是梳发用具, 其上的图案是绳子的缠结形。笔者认为, 大汶口文化象牙梳子上的图案既不是八卦符号雏形, 也不是太极图, 其功能就是用于梳发, 但图案不是一般的工艺构图, 其赋有了制作者的智慧, 是“文字图画”的创意设计, 原因有三:

第一、从泰安大汶口 M10 和 M26、莒县陵阳河 M12 和 M19 梳子在墓中出土的位置均在人骨的头顶处^[23]来看, 功能很有指向性, 如果用于算卦、观天应置于腹部以上的视线范围, 不应放置在头顶(陶寺圭尺放置在 IM22 墓头端墓室东南角^[24]), 所以大汶口文化象牙梳子功能确实是用于梳发, 没有其它功用。由于梳子在男女墓中都出现, 说明当时的人们十分重视梳理头发, 并流行梳髻。

第二、图案以字符“○”、“≡”、“T”、“S”为基本元素构成, 而不是用自然界之物图符, 此与同文化陶器上的图案有明显的区别, 显然这些是经过抽象的、已被当时的人们共识、规范的“文字符”。

第三、这些“文字符”应该是制作者表达梳子功能, 或者是给使用者带来神魂荡扬的语言文字。

象牙梳子上的图案“文字符”在滇东南古彝文文献中也比较常见, 现将其与之对照释读如下: 表 2 是象牙梳子上的图案元素“字符”与《滇南彝文字典》^[20]对照释读表, 整个图案综合起来, 释义为:

“平安梳”“梳掉你的忧愁、烦恼和悲伤, 让你的秀发在空中飘然。”

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 即“象牙具有辟邪、防护的功用”, 其与三星堆的象牙“驱妖降魔、消灾解厄”^[15]功用如同一辙, 也许这是三星堆文化源于大汶口文化的考古学证据之一。

在彝族文字系统中, 由单体类的文字性符号组成词组或句子的现象普遍存在, 大汶口文化也是如此。东夷人用象牙来制作梳子, 他一定知道象牙所寓意的辟邪和防护功用, 实际上他用三个“○”字符组词只有右边的“鬼”属表意字, 中间和左边的两个字符是表音字, 其借助了“象”、“驱除”、“防护”与“鬼”字相同的谐音, 读为“鬼驱的象牙梳”, 这是主谓颠倒的语句, 语意则为“驱鬼的象牙梳”, 东夷人的语法结构与彝语相同。再说用连续的“≡”字符构成“S”形状, 也由单体类的文字性符号组成了句子, 并具有重复、增强梳子功用的意义。

表2 大汶口象牙梳子上的图案元素“字符”与《滇南彝文字典》^[20]对照释读表

刻画符	载体和位置	古彝文字	彝文释义	页码
	象牙梳 顶端		“象”、“鬼”、“防护”、“消除”，顶端透雕的“○○○”为三个“○”字符组成的语句，从右至左为“鬼”、“驱”、“象牙”，动宾颠倒，释义为“驱鬼的象牙”，与载体的“物语”构成“标题”，释义为“驱鬼的象牙梳”，即“平安梳”。	第 435-437 页
	象牙梳 中间		“飘”、“飘然”，象牙梳图案中将字符“S”左上右下的弧线变成了“S”断点链接，刻写时做了艺术化处理，“S”两端头的断点非闭合性比较明显，并非“8”字。 如果只是字符“S”，意为“丝”或“线” ^{[20]221-222} ，与载体功能对象配合意指“头发丝”，所以整个字符释义为“飘飘而然的发丝”。	第 38 页
	象牙梳 “S”构图 元素		“砍”、“伐”、“忧愁”、“烦恼”、“悲伤”，与载体功能配合意指“梳掉忧愁、烦恼和悲伤”。字符“≡”既有动词，又有名称，其连续使用是为了强调梳子的功能。	第 320-321 页
	象牙梳 “S”内填		“星星”、“毛”，这里的“星星”寓意“天空”“空中”，也有“发毛”之意。	第 197-198 页
			贵州本《简明彝汉字典》（贵州民族出版社，2018年，第156页）为“天”、“天空”。	

2.3 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 M44 出土的龟甲刻画字符

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 M44 出土有“两付龟甲，一付（M44: 26）发现在人架的左腹上，背甲上、下各有4个穿孔，腹甲上有的刻画符；另一付（M44: 13）发现在人架的右腹上，背甲偏下部有4个穿孔，下端边椽有8个穿孔。腹甲上有五个刻画符。”^[25]图3为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出土的穿孔及刻画字符龟甲。《探掘报告》认为“穿孔龟甲作甲囊使用”，而且“这些龟甲的穿孔可能是为了便于穿孔绳索或系缀流苏之用。”^[25]学者王树明也认为：“大汶口人佩戴龟甲，是为攘除疾病，消灾厌胜的。”^[26]实际上这两付龟甲是经过占卜后的甲囊，而且是用背甲卜阳卦后的遗物，卜辞和刻写在了腹甲上，如果“穿孔只是用来穿孔绳索或系缀流苏之用”就不必要钻如此之多的孔（M44: 13 下端边椽有8个穿孔可能是系缀流苏之用）。《探掘报告》认为龟甲（M44: 26）上的是绳索磨痕^[25]，笔者认为是有意的刻画符，因为龟甲（M44: 13）上的是有意刻画的卜辞，（M44: 26）龟甲也是如此，王树明先生也

否定了“绳索压磨之说”，指出“无疑是先民有意识刻磨的”^[26]。

刻画字符和在滇东南古彝文献中比较常见，表3是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 M44 出土的两付龟甲上的刻画字符与《滇南彝文字典》对照释读表。从中可知，运用古彝文字来解读这两个刻画字符确实证实了《探掘报告》的“穿孔龟甲作甲囊使用”的结论，而且是墓主请巫师为他占卜后随身携带的甲囊。龟甲（M44: 26）发现在人架的左腹上，龟甲（M44: 13）发现在人架的右腹上，说明当时的人们有了“左为阳，右为阴”的“阴阳观念”（为“阳”于左，为“阴”于右），龟甲（M44: 26）和龟甲（M44: 13）是一对阴阳甲囊。

龟甲（M44: 26）腹甲上只有一个字符，王树明先生认为可能是甲骨文“爻”字的祖型^[26]，值得商榷。

在古彝文献中是一个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符，三星堆2号祭祀坑出土的石边璋也出现，释义为“消失”或“死亡”^[15]，与大汶口文化龟甲和象牙梳上的字符一脉相承，它既是表音字，又是表意字。在彝族

语言中,“大象”、“百”、“守护”、“驱除”、“繁”、“鬼”、“魂”都是同音,不过“○”是“鬼”的表意字。彝人认为“实心圆”是有灵魂的实体,“空心圆”是失去灵魂的“鬼”,就如杨甫旺先生所说:“魂与每个人的生命休戚相关,不可或缺。每个人活着都有自己的魂,人死之后魂变成了鬼。”^[27]显然大

汶口文化时期的东夷人与彝族的鬼魂观念如同一口。龟甲(M44: 13)腹甲上有五个字符“○”,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卜辞,从上到下释义为“驱鬼”、“招魂”、“长命百岁”,其中“驱鬼”是“招魂”前提,要在没有鬼的条件下才能“招魂”,有魂的人才能确保“长命百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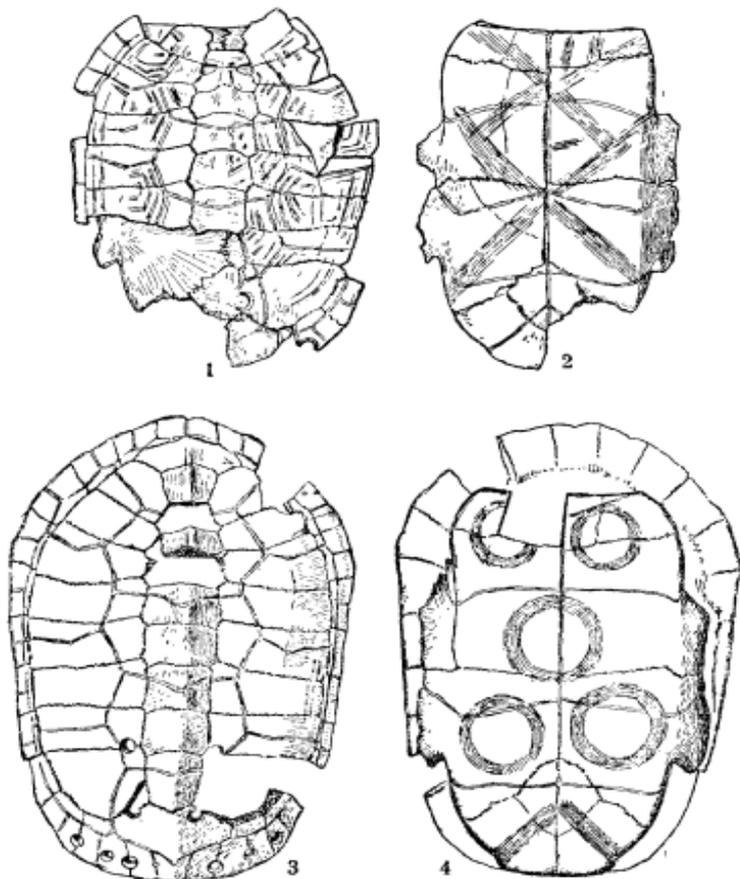


图3 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出土的穿孔及刻画字符龟甲(1、2大·M44: 26, 3、4大 M44: 13)

表3 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 M44 出土的两付龟甲上的刻画字符与《滇南彝文字典》*对照释读表

刻画符	载体和位置	古彝文字	彝文释义	页码
	龟甲(M44: 26)腹甲		为卜辞“忍”、“克制”,这付可能是墓主人随身携带的随时告诫自己控制情绪用的甲囊,这种解读反映了墓主为“身躯高大、骨胳粗壮,年轻力壮的人” ^[28] 的特征。	第 242-244 页
	龟甲(M44: 13)腹甲		为卜辞“鬼”、“魂”、“消除”、“百”、“昌”,五个“○”分别表示不同的含义,上面两个“○○”释义为“驱鬼”,中间“○”为“招魂”,下面两个“○○”为“百年之魂”,与载体的“物语”之“龟寿”构成“长命百岁”,显然这是一件“禳灾祈福”甲囊。	第 435-437 页

3 结语

通过大汶口文化刻画字符与《滇南彝文字典》对照释读,证实了冯时先生所说的“运用古彝文解读上述文字资料,在使文字本身得到圆满解释的同时,更可使文字与其载体之间的关系得到合理的说明。彝文字体系是与夏文字同时共存的古老文字。”^[13]的论断,难怪滇东南一带的彝族支系阿细人世代承传有曾经“到过太阳升起的地方”,迄今还保留着与日照市天台山上一样的日月祭祀塔,日月崇拜世代承传^[28]。

莒县大朱家村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头向东南,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随葬品中几乎都有背壶、双耳壶,且绝大多数放置在头部和肩部位置^[17]。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墓葬也是仰身直肢,头向135°(东南)^[29]。吴汝祚先生认为:“大汶口文化墓葬的头向,有可能表示传说中大汶口文化居民起源地的方向。”^[30]“彝族巫师认为,人死了,其亡魂就要去祖先发祥地,否则会变成野鬼。”^[27]实际上,这种墓葬形式正是体现《彝族指路经》中灵魂的幽冥世界去向——回归祖地的最有力的证据(彝族以云南为祖地),也是证实彝族先民源于大汶口文化居民的可考的地下出土文物。值得注意的是“壶放置在死者头部和肩部”的葬俗,这在《彝族指路经》中寓意为“让死者在回归祖地的路上有水可饮,不要返回来向亲人讨水。”“仰身直肢”寓意为“回归祖地的路途遥远,直肢才能走得动。”其如宋镇豪先生所说:“中国上古时代人们为使本族的鬼魂有共同的归宿,在死尸的丧葬处理上,常保持了较一致的葬俗,埋葬的姿势头向也有特殊的含意。”^[31]这就是《彝族指路经》中贯穿始终的灵魂的幽冥世界去向——回归祖地文化在逝者身上的具体体现^[32]。所以从墓葬的形式来看,大汶口文化与彝族先民密切相关。

大汶口文化的刻画字符并非“几个孤立的图形”或“单体类的文字性符号”,他的最大的特点是字符与载体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语言文字,甚至有了用两个及以上的字符表达或组成语言文字的现象,完全可以说是“正式的文字”了。众所周知,表音是符号记录语言的,表意是以字形来表示字义的。大汶口文化的刻画字符既有表意,又有表音,说明其已经进入了较高的文字发展阶段。我们从前面的11个字符来看,其明显已经超出了“图化文字”阶段,甚至有些(如大汶口象牙梳子上的雕刻字符和江苏

邳县大墩子遗址M44出土的两付龟甲上的刻画字符)已经比较成熟,脱离了象形文字的表意文字阶段,以抽象的字符实现了字、音、义的统一。从前面考释情况来看,大汶口文化时期同一字符的“字义”依用途和载体变化而改变,单个的字符是很难确切释读的,如大口尊上的五个刻画字符,如果这些字符出现在其他的载体,没有出现在墓葬中,就有另一种“字义”的解读。

马锦卫先生认为:“彝汉古文字虽然都是表意文字,但是,所反映出来的象形符号是不一致的。”^[33]大汶口文化“字符”和彝族文字系统一样,不能与“甲骨文形体结构相对应”,如果用这种思路去释读是错误的,而且即使一样的象形符号,其“义”也不一样,这一现象在大汶口文化中比较突出。如尉迟寺墓葬大口尊(M96)上的字符和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M44出土的龟甲(M44:26)刻画字符,这些字符用古彝文解读比用甲骨文或金文形体结构相对应解读更符合大汶口文化特征。刘志基先生也认为:“表意是以字形来表示字义的,很容易诱导人们将某一特定的字形符号与某一特定意义联系起来判断字义。”^[34]这就是目前我们释读史前“文字”过程中最容易犯的错误,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以用途和载体为标准来判读,正如李守奎和李铁两位学者指出:“研究原始图符依凭的是历史文化背景知识,解释的是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35]

彝族承传了大汶口文化刻画字符,五千年来虽然有些变化,但还有相当一部分被保留了下来,本文所考释的11个大汶口文化字符与古彝文字完全相同或相似,说明了彝族先民与大汶口文化居民之间曾经有过在同一个时空框架下交往、交流和交融,其如林向先生所说:“一般来讲考古学文化是历史上‘人们共同体’(氏族、部族或民族)在物质上的反映,文化因素的相通,意味着人们共同体在文化上的交流;大量的或基本的文化因素相同,则表示人们共同体之间族的亲缘关系。”^[36]

这里还想特别指出“大口尊在大汶口文化中,最早出现在中期,多数出现在晚期。同时,刻画图案(字符)与大口尊又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1]根据《试论大汶口文化的分期》^[37]一文得知,大汶口文化持续时间从公元前4500年至前2300年,中期到晚期结束至少有1200年,1200年在大汶口文化区域内得到广泛使用同样的“字符”,刻写在同样的位置,说明了什么?唯一的答案就是这种“刻画字

符”已经成为了大汶口文化区域内定型、规范,并公认的“文字”,其正如张学海先生所说:“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文字,有象形字、会意字,有的字分别在鲁东南、皖北多次出现,字形的一致,如出一人之手,可见当时已有定形规范的文字,当已超越文字的萌芽阶段。”^[38]大汶口文化“字符”的传播与时空特征,证明了它们不是一种氏族标记,不是陵阳河遗址地理环境特有的标志,而是具有记录和传达语言,扩大语言在时间与空间上交际的功用成熟文字。

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人们能够用字符为元素创作出意义深奥的象牙梳工艺图案,其雕刻工艺具有与时俱进、超越时代的艺术底蕴,表明了当时人们已经有了较高的视觉、心理、应用及审美需求。从构图的四个字符元素及其图案来看,创作者不仅熟悉四个字符的“字义”,而且已经有了用这四个字符构图的抽象思维能力。不仅如此,使用这把梳子的人也知道四个字符的含义以及图形所赋有的寓意。这种所体现的文化水平,再次证明了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有了成熟、规范的文字,其正如邵望平先生所言:“说明它绝不是工匠的任意刻划,也不是一家一族、一村一寨的标记。而是在相当范围内或相当大的人们共同体内认同了的具有特定社会意义的意符文字。”^[38]

参考文献

- [1] 王吉怀,赵天文,牛瑞红.论大汶口文化大口尊[J].中原文物,2001(02):45-54.
- [2] 王树明.双墩碗底刻文与大汶口陶尊文字[J].中原文物,2006(02):33-39+58.
- [3] 李学勤.论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J].文物,1987(12):75-80+85.
- [4]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J].考古学报,1981(01):3-46+149-150.
- [5] 王晖.汉字正式形成于距今5500—5000年之间[EB/OL].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7-23.
- [6] 卢丁.汉字的起源及早期发展[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3):74-80.
- [7] 邵望平.远古文明的火化——陶尊上的文字[J].文物,1978(09):76-78.
- [8] 张学海,李玉亭.大汶口文化的新发现[J].华夏考古,2009(04):59-62+77.
- [9] 郭雁冰.大汶口文化陶符新解[J].中原文物,2000(4):8-10.
- [10] 李辉.华夏民族共同体起源的自然与文化人类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4(4):7-24+142+147.
- [11] 严文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新发现[J].考古,1979(1):47-52.
- [12] 王震中.夷夏互化融合说[J].中国社会科学,2022(1):133-158+208.
- [13] 冯时.试论中国文字的起源[J].四川文物,2008(3):46-49.
- [14] 段树乔.基于彝族历史文化视角的具茨山之名及其早期凹穴岩画考释[J].民间文化论坛,2024(6):待发.
- [15] 段树乔.彝族历史文化视角下的三星堆文化[J].贵州工程技术应用学院学报,2024(04):23-35.
- [16] 段树乔.从彝族阿细祭祀文化和占卜释读陶寺扁壶朱书“文字”[J].云南社会科学·彝民族文化,2021(1-2 合刊):21-24.
- [17] 何德亮.莒县大朱家村大汶口文化墓葬[J].考古学报,1991(02):45-84+143-150.
- [18] 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等.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发掘简报[J].史前研究,1987(3):91.
- [19] 徐安武,杨晓勇等.大汶口文化陶大口尊产地的初步研究[J].考古,2000(8):87-92.
- [20]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滇南彝文字典[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239.
- [21] 山东宁阳大汶口堡头村古代遗址出土的彩陶、黑陶、白陶及骨雕[J].文物,1960(02):2-6.
- [22] 张向阳.五千年前大汶口文化象牙梳暗含神秘“太极”[N].齐鲁晚报,2011-7-26.
- [23] 杨晶.史前时期的梳子[J].考古与文物,2002(5):31-39.
- [24] 何弩.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级大墓 IM22 出土漆杆“圭尺”功能试探[J].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3):261-276.
- [25]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J].考古学报,1964(2):12-59+208-225.
- [26] 王树明.大汶口文化墓葬中龟甲用途的推测[J].中原文物,1991(2):22-26+36.
- [27] 杨甫旺.论彝族魂魄观念[J].宗教学研究,2011(01):166-170.
- [28] 段树乔.彝族阿细源流(西周-清末)[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8:69.
-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94(1):1-13.

- [30] 吴汝祚. 大汶口文化的墓葬[J]. 考古学报, 1990(1): 1-18.
- [31] 宋镇豪. 中国上古时代的丧葬礼俗 [EB/OL]. <https://www.docin.com/p-67640510.html&endPro%3Dtrue>.
- [32] 段树乔. 阿细源流[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4: 200-202.
- [33] 马锦卫. 彝文字符文化特征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9): 25-30.
- [34] 刘志基. 试论汉字表意字素的意义变异[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2): 40-45.
- [35] 李守奎, 李轶. 表意字的表达功能与古文字考释[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5(2): 139-144.
- [36] 林向. “禹兴于西羌”补证 ——从考古新发现看夏蜀关系[J].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4(3): 7-9.
- [37] 高广仁. 试论大汶口文化的分期[J]. 考古学报, 1978(4): 399-420.
- [38] 王恩田, 田昌五, 刘敦愿等. 专家笔谈丁公遗址出土陶文[J]. 考古, 1993(04): 344-354+375.

版权声明: ©2024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